

联邦共和国的 贫困

论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化

〔西德〕于尔根·罗特著

联邦共和国的贫困

论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化

〔西德〕于尔根·罗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
72级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师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合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Jürgen Roth

ARMUT IN DER BUNDESREPUBLIK
Über Psychische und Materielle Verelendung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4

根据菲舍尔袖珍书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联邦共和国的贫困

论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化

〔西德〕于尔根·罗特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

72 级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师

商务印书馆翻译组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⁸/₁₆ 印张 156 千字

1975 年 10 月第 1 版 197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45 定价：0.61 元

目 录

前言	3
第一部分: 联邦共和国精神贫困化的 条件和后果	11
劳动是精神贫困化的一个原因	11
劳动场所的事故	12
不熟练工人的特殊负担	18
职业病	19
过早丧失劳动能力	25
工业劳动造成的危害和负担	27
自动作业线和计件制	32
汽车制造业中的计件制	34
妇女的劳动条件	39
青年职工	43
企业主对工人精神贫困化的反应	43
关于劳动条件和疾病关系的调查	47
环境对精神状况的影响	54
贫困和疾病	56
疾病是精神贫困化的一种表现	61
第二部分: 物质贫困化	76
收入和物价	76
财产的集中和物质的贫困	84
1973—74 年经济危机期间的失业和缩短工时	85
第三部分: 日常的贫困	104
贫困化对个人的影响	104

德国城市的景象	106
没有房子住是制度化的贫困形式	132
“自由的住房市场”的情况	145
法兰克福西区的市容整顿	148
房租	153
贫困家庭的社会化	159
童工	159
社会化的一般状况	162
虐待儿童行为	166
社会化的代办所——学校	168
训练人接受压迫的教养院	178
犯罪是社会化的产物	183
老人的境遇	189
农民的贫困化	192
第四部分：社会工作是再生产物质贫困	
和精神贫困的代办工作	
(安泽尔·魏德纳著)	206
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冲突及其社会根源	208
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冲突的政治解决及其在	
日常社会工作中所遇到的障碍	215
各项法律	219
组织条规	227
社会工作的方法	229
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概观	232
社会工作加剧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贫困——	
以无房住者的管理机关为例	234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于尔根·罗特(1945—)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年作家。除本书外,他的其他著作有:《联邦共和国是警察国家吗?》、《土耳其是伙伴还是为西方自由服务的刑具?》、《收容所的孩子——联邦共和国的幼儿、儿童收容所的调查报告》等。

本书于1974年在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出版,全书共四部分,前三部分在“精神贫困化”、“物质贫困化”、“日常的贫困”等标题下提供了不少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事例和材料,对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重要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在由安泽尔·魏德纳署名的本书第四部分中,作者没有涉及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根源和要害,更没有指出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摆脱贫困而斗争的正确道路,而是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大谈什么“社会工作者”(主要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中的“济贫”工作人员及监管贫民的工作人员)应当“同被保护人(指贫苦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等等。对作者的这种立场和观点,请读者注意予以分析和批判。

本书一些带引号的文句,仅一部分注有资料出处,对这些资料出处,我们未予翻译。

本书第一、二部分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72级

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师译出，第三、四部分由本馆翻译组译出。译文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1975年6月

前 言

奥斯卡·汉夫和他的妻子在帕绍附近的罗特哈尔明斯特一家纺织厂里干了多年。1973年11月底，这家企业由于“订货减少”而解散了。从此，汉夫夫妇就失业了，而找一个新的工作又渺茫得很。1974年2月，在银行也不提供贷款之后，这个家庭只得申请社会救济。在此之前，他们通过计件工作挣得的一部分消费品也不得不送进当铺，否则他们就无法偿付私人小住宅的分期付款的款项。

不仅仅是少数几个例外，而是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遭到了与汉夫一家相似的命运，不仅仅巴登瓦尔德是这样，在其它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失业和毫无希望找到新工作的现象也日益严重。1974年1月，在各劳动局管辖地区登记失业的男女工人达到20%。1973年12月，仅纺织业就有2万余名失业者和10万名半失业工人。首先涉及那些靠副业收入来养家，买洗衣机、电视机或汽车的妇女。大多数这样的工人家庭有好几个孩子。现在福利的美梦一下子破灭了。为了使男女工人的失望不转化为政治上的反抗，有人要求他们换个地方，搬到别的城市去，到处转转，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工作。因为这些人已不再要求得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而只要求“有一个工作”。可是“随便要求人们四处奔走是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妇女有权在她们家庭附近找一个工作。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

点,它就无权称自己为自由的和代表社会的国家。”(纺织服装业工会主席卡尔·布施曼 1973 年 12 月 13 日在波恩纺织工人抗议大会上的讲话。)

1973 年 9 月,工人卡尔·基斯特在杜塞尔多夫被解雇了。与他的 8 万名被解雇的建筑工人同行一样,他成了稳定政策的牺牲品。现在这个政策的数十万牺牲品不得不坐在街头,前往劳动局,填写申请单,然后等待着失业救济金。

基斯特过去每月纯收入为 1,100 马克。这笔钱得抚养三个孩子。他的三间一套的住房房租是 350 马克,他可以得到 100 马克的房租补贴。现在他领到的失业救济金只是他过去纯收入的 55%。当他后来付不出房租时,便接到退房通知,于是他不得不搬进临时居住处,即贫民窟。这里,除了物质贫困化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更高形式的贫困化,即精神贫困化。他开始喝酒,而他的妻子则去做清洁工。4 个月后他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失望和不满与日俱增。他精神失常了。他的孩子们在“看管所”,“因为我们家里地方太小”。

至于那些目前尚未被解雇的人,也唯恐失去工作。所以大多数工人,由于害怕因病而被解雇。即使发烧或发生工伤事故,也还在工作。《快捷》(Quick)杂志在一篇论述失业的优越性的报道中这样说:“这样我们必定能消除经常有人生病的现象。”在 1966 至 1967 年间的经济危机时,人们十分惊奇地看到:“雇佣工人对工作表现得特别卖劲,他们是以此来对付困难处境的。”

“每两分钟就有一个人从四条自动作业线那边喊道:嘿,卡尔洛斯,这里,这里,向前,向前。我只能跑着干活,每天我

推着手推车跑 20 多公里，屁股总是湿的。晚上我精疲力竭了，不为什么事就拿老婆孩子出气。”或者，“他们甚至藏在机器后面监视我们。”因为：在经济危机时期，随着对通过工会斗争得来的权力的限制，工厂对工人的管理也在加强，工人由于害怕失去工作不敢反抗。现在他们什么脏活都得干。一位达姆施塔特的厂主这样说：“因为他们能够就业就够高兴的了。”如果他们不干这些脏活，就得离开工厂。另外下面所述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多：1973 年初在达姆施塔特，一些土耳其妇女被一家大洗衣店按正常的劳动条件的合同雇佣。随着危机，气氛也起了变化。现在如果洗衣店里有活儿可干，这些土耳其妇女就得以极快的速度不停地干，直到干完为止。如果在规定的劳动时间内没活干，他们就得回家，而在这段被迫休息的时间他们得不到工资。当这些土耳其女工口吐怨言时，她们挨了店主的耳光，然后被解雇了。对这类事，劳动局说：“这不是我们的事。”

哈根市工人彼得·希尔克叙述了下面的事：“12 月份我终于在城外找到了一个炼钢的工作，可是在那里，我得到的计时工资却减少了 25%，于是我不干了。今天谁还为 6.25 马克去干炼钢活儿？一回到劳动局就热闹了。人家问我，现在工作这样少还拒绝工作是不是疯了，工资还说过得过去嘛，等等。几天前，我尝到了拒绝工作的苦头，4 个星期的一切救济金都被一笔勾销了，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那我就根本休想得到失业救济金了。”另一些工人就得承担起被解雇的伙伴们的工作，一部分人要操纵以前是三、四名工人负责的好几台机器。

尤其是那些 1973 年秋季积极参加过自发性罢工的工人，

深受加强纪律之害。各康采恩非法商定解雇这样的工人或不再雇用他们，曼纳斯曼的工人被解雇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1973年10月，他们由于参加罢工而被解雇了，直至今日，仍然找不到新的工作。每当他们说他们是来自曼纳斯曼时，人事部门就把他们拒之门外。

上面所举的全部事例都属于1974年3月和4月所统计的60万失业者和20万半失业工人的情况。他们正日复一日地扩大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数百万穷人的队伍。这里还不包括那些因为取消加班而比以前大大减少了收入的工人。如果1972年平均24%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家庭生活于贫困之中，那么——不包括1973至1974年间失业者和半失业工人的数字——随着1974年经济危机到来，至少有27—30%的家庭的收入处于最低生活水准之下。单身最低生活的标准是600马克，有孩子的家庭至少需800至1,000马克。随着各方面危机的加剧，特别是由于物价上涨和工资的下降，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人与每月平均有1,900马克收入的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一部分之间的差别则已消失。1973年，主要食品的价格上涨了40%，暖气费用上涨了200%。所以，那些过去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比较有保障的所谓“标准工人”，面临这样的通货膨胀，经济状况也在恶化。

失业工人和半失业工人将难以摆脱与那些始终生活于贫困之中的人们同样的命运：即持续性的失业，微薄的收入，干脏活，欠房租，饥寒交迫。他们得节省，这就是说，因为费用高昂，人们不给烧暖气，冬天在家里就得多穿几件毛衣。法兰克福的一位法官在处理对一名房东起诉的案件中这样说：“寒冷

并不损害健康。”

在联邦共和国广大居民事实上不断贫困的情况下，也应谈一下职工的工资斗争。他们要求补偿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而减少的收入，但回答这个要求的却是大规模解雇的威胁。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邦政府对此事表态说：“毫不含糊地说，1974年不会是实际收入大大提高的一年，在目前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应该明白，总的来说，能使实际收入保住在已达到的高水平就不算是降低了，劳资合同工资增长百分比的两位数数字促进了物价相应上涨的危险。”

在联邦政府的1973年年度经济报告后面附有这样一个统计材料：签订一个平均提高大约12%的劳资工资合同就意味着将有65万人失业。在联邦劳动部和联邦政府的各项调查中，人们私下估计平均有120万人失业。

这一切的后果是：日益增长的物质贫困化，物质缺乏，阻碍参加社会生活——即精神贫困化。

新的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造成贫困化客观状况的各种因素迫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经济的不断集中和资本主义制度技术的提高，那些物质和精神日益贫困的工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一方面是社会财富集中于极少数资本家阶层中，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分享共同劳动成果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

尽管如此，还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即认为贫困只不过是历史现象，贫困并不具有群众性，而只存在于“边缘上”。所谓“边缘”是指：某些没有适应能力的外层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那些无所要求的人。今天有人仅把失业者、被劳动过程淘汰的养老金领取者、多子女家庭或无住房的人划入

贫困之列。迄今为止，资产阶级科学家们在分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福利国家时，也只是局限在调查这些处于边缘上的人们。

现实的情况却是另一码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4—25% 的家庭由于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准而生活在贫困之中。由此产生了很多的个人及社会的困难：缺乏住宅，使人疲惫的工作条件，疾病，社会化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听天由命的态度等等。物质的贫困不只是落在工人阶级头上，那些小业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也遭了殃，由于生产不断集中而走向破产。

社会贫困就是：穷人的居住条件不象样子，孩子最多上十年制的国民学校，而大多数只能上特别学校，因而低人一等，他们的个人意志和社会积极性受到阻碍。自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穷人的社会条件只是部分地起了变化。与一百年前一样，婴儿死亡率很高，寿命缩短，丧失劳动力的比率很高，很多人患身体和精神疾病，很多孩子送到看守所，刑事犯罪很多，社会地位下降。那些没有机会受到专业训练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训练标准的青年人在扩充着未经训练或训练很少的工人后备军。

贫困的另一面是精神贫困化，它是一般的生产条件的表现。这就是说：贫困不仅是物质贫困化的产物和由此派生的影响家庭和环境条件的各种因素的产物。贫困也产生于精神贫困化，这种精神贫困化是由主要的劳动条件如被催赶着干活、计件工作和自动作业线所造成的。

这种精神贫困化表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贫困化的一个新阶段：即脱离政治的倾向。与精神贫困化相关联的是不再参

加社会和政治活动。精神贫困化造成了反应迟钝、神经质、好争吵和消极，这一切大大改变了那些有能力积极的工人的举止和态度，总之他们只会进行单纯的消费。这样就造成了那些生活于贫困之中的、对生活条件无所谓和听天由命的人最先支持统治阶级。请注意：“不是群众的麻木不仁导致社会中坚的统治，而是社会中坚的统治使群众变得麻木不仁了。关于被压迫者天生低人一等的理论是压迫者故意制造的谎言，是借以维持殖民统治和阶级统治的许多神话之一。”

然而，认为联邦共和国内的被压迫者必将永远采取这种政治上的麻木不仁态度是错误的。虽然对有依附性的居民来说，积极参与政治还有相当多的障碍：作为社会一体化的前提是这个社会迫使人们去适应环境，而迫使人们去适应环境又是通过对不去适应环境的工人，也就是进行反抗的工人实行歧视和加强管理的一系列措施贯彻下去的。为了能在与外界隔离的居民区活下去而每天进行的奋斗，外界的压力，以及对失去工作因而无法生存的恐惧，使劳动人民难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更严重的是“社会下层”的处境：如果他們要最低限度地摆脱贫困化的状况，就得全力去适应环境。此外，贫民窟的那些由于低人一等而与工人阶级大多数分割开、始终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的人，从来也不团结。尽管有这种种障碍，但是卡塞尔的无房住的人们抢占住房或空房却清楚表明，这个国家的穷苦的人们已开始自发地起来反抗造成他们贫困化的制度。

第一部分 联邦共和国

精神贫困化的条件和后果

劳动是精神贫困化的一个原因

精神贫困化是由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而引起的，结果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病态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总能从整体上加以阐明的。这些变化有一部分是在受害者周围的人们还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就已持续几年了，然后作为精神的障碍爆发出来。

我们想在这里探讨一个命题，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劳动条件是精神贫困化的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原因，这就是说，劳动对职工身心有影响，也就是有产生疾病的影响。对此，一方面可以把疾病理解为对社会产生疾病的条件进行个体反抗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人们在现存社会条件下不得不忍受的深重苦难的一个标志。现在这里只谈把生产过程看作是致病的因素的问题。“要是大多数作者连同受害者自己在内看到了精神上受到损害的原因，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企业中的状况是起着引起疾病和加重疾病的作用。”很显然，这就是指自动化或者象人们所常常称作的技术世界。同样，害怕失业或者害怕调换到新的不熟悉的工作岗位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生产关系是劳动人民贫困化的标志，那么一方面劳动条件，另一方面工艺的发展，最后是它们本身的影响和客

观的后果，必然成为贫困化的原因。生产关系对工人的存在和意识打下了决定性的标记。“每一种病兆、每一种疾病、或每一种病态都是为着生存而进行的劳动和由于这种劳动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带来的劳损的表现。就是先天性的疾病和生理缺陷也是这种劳损的后果。孕妇在胎儿的某一个发育阶段，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只要经受一次紧张、害怕、劳累过度，就会生出一个畸形的孩子。”

劳动场所的事故

然而，工业劳动场所对于产生精神贫困化的作用不仅限于精神病方面。职业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同样是经常性的威胁：据统计在1971年就有260万人发生工伤事故和患职业病。其中：

——28万人过早地失去就业和劳动能力。

——每20名就业者就有一个人害公认的职业病。

——每年计有超过10万起有严重后果的工伤事故。

——4,200人死于工伤事故。

——每13秒钟发生一起轻度的工伤事故。

——每两分钟就发生一起重大工伤事故，每两个小时就有一起死亡事故。

用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费特尔的话来说，这种占支配地位的劳动条件所引起的致命的劳损“是我们经济制度中的最高原则，即私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特性所造成的。要完全实行劳动保护规定，是很费钱的，而且一涉及到降低成本，人的利益就不予考虑了。损害健康的另一个根源是无数合理化